



在那高高的冠峰山上(上)

□王剑波

冠峰,是一座山的名字,位于浙东宁海西南隅。它的主峰鸡冠尖海拔868米,就像一只昂首的雄鸡,矗立在天台山脉的群峰之中。冠峰,又是一个地域的名称,当年属于宁海县王爱公社(现属岔路镇),是山岙间16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片区。

1973年,一些中学的高中在停课多年以后已经恢复招生,但僧多粥少,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未能升学。于是,按照毛泽东“五·七指示”和关于“把学校办到各个山头上”的“七·三〇指示”,宁海县在全县各地办起了47所半农半读的“五·七学校”,而“冠峰五·七学校”(习惯上称冠峰中学),是校址最高、最偏远的一所。

我于1972年初从桑洲中学初中毕业后,去三门湾畔的青珠农场打零工,人虽在棉花地里劳动,但心底里还是渴望能有机会进学校读书。冠峰中学的开办,给了我希望。经过一番争取,我终于收到了入学通知书。

1973年3月15日,一个草木萌芽的春日,16岁的我挑着铺盖行李,带着锄头柴刀,跋涉五十里崎岖山路,和58位同学一起,成为冠峰中学的首届学生。

■ 建校

冠峰中学的校址原先是公社林场。两栋乱石垒砌的“山厂”(管山人休憩的房子)蹲伏在离鸡冠尖百米之处的山坡上,一栋用作教室和男生宿舍,另一栋是厨房、教工寝室和女生宿舍。“山厂”四面透风,碰到雨天,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。高山上的春天潮湿而寒冷,同学们大多只带了一条薄薄的粗布棉絮被,垫的是用稻草编织的“稿毡”,为了抵御夜寒,时常两个人拼铺取暖。于是,开学伊始的第一项任务,就是建造新校舍。

建校舍首先需要砖瓦。学校请了专门的烧窑师傅,学生们就成了“小工”,抬石挖土,在教室旁边的山坡上建起了一座“窑厂”。在烧制砖瓦的日子里,我们自己动手和泥制作砖坯,翻山越岭砍来烧窑用的木柴。烧窑是一门技术活,每逢封窑之夜,唯恐火候掌握不好影响砖瓦质量,大家轮流值班守候窑前,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到了出

窑之时,同学们排成长队,“击鼓传花”般接龙传递新烧成的砖瓦。刚出窑的砖瓦温度很高,就像“烫手山芋”一样,每个人一接到手就马上抛给下一人,一旦失手,往往笑声、喊叫声响成一片。

学校所在位置地势高低不平,两排“山厂”之间有好几米的落差,唯一通往山外的一条羊肠小路蜿蜒曲折,也没有一块稍微开阔的平地可以用来上体育课。在建造新校舍的同时,师生们开始营建校园。先是拓宽进校道路,在路两旁栽上水杉;再是将校舍旁的一块水田平整后作为活动场地;后来又削平一个小山包,造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操场。山上只有石头和泥土,操场上用来跳高跳远的“沙坑”徒有其名,同学们走十几里山路来到白溪一担一担挑来沙子,才有了名副其实的“沙坑”。

1974年秋天,当第二届学生进校的时候,终于有了明亮的教室和温暖的寝室,有了校园林荫道,有了高山运动场,教室里的书声伴着运动场上的呐喊声,人迹罕至的冠峰山有了真正的学校。

■ 上课

全班同学中,最大的21岁,最小的14岁,大部分是十六七岁,都是初中毕业在家务农一二年后再进学校,大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。加上出门就是大山,离最近的村庄都需要走半个小时,只要不是劳动时间,同学们都是在教室里学习。起初是在“山厂”里上课,一阵山风吹来,书本簿子到处乱飞。山里不通电,到了晚上四野一片漆黑,只有教室里悬挂的汽灯发出白光,并伴随着“嘶嘶”的声响和若有若无的煤油气味。我们每天晚上就在发白的灯光下自修。这种情景,现在想起倒是有“清风不识字,何故乱翻书,莫道萤光小,犹怀照夜心”的意境。

入学第一年,全校一共就四位教职工。章必君老师教数学同时负责教务,陈贤能老师教物理兼会计,柴相观老师教语文兼总务及出纳,还有一位食堂炊事员王乘形。公社教办主任夏方丁老师负责学校的筹办工作,也经常在学校办公。到了第二年,王廷端老师调来担任学校负责人,倪安铨、卢崇辉、柴振亚等陆

续调人,成了我们的任课老师。

柴相观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。他毕业于黄埔军校,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经历过抗战硝烟,又在共产党的建设兵团里屯垦戍边。我偏爱语文,听说柴老师来自遥远的新疆,使我对语文老师、对语文课充满了期待。柴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子瘦高、面容清癯,有一种饱经沧桑的神采。他讲解字、词、句细致落实,分析课文条理清晰,这促使看书浮光掠影的我静下心来钻研课文。开学不久,学校交给我一项任务:编写节目反映创办“五·七学校”的情况。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趴在床铺上写出了一个剧本。初稿交出后,柴老师花了很多功夫替我修改润色,还请他曾经是新疆建设兵团八一农场文工团演员的夫人担任导演。虽然这个剧本最后没能上演,但让我尝到了创作的快乐。

到了高二的时候,语文老师换成了倪安铨。倪老师曾经是湘湖师范的教师,据说是因为被打成“右派”而下放回家。他有着一种老派教师的风范,文弱谦和,知识渊博,对同学和蔼可亲,对教学却极其顶真。那时的课文并没有多少文采,但倪老师的讲课为我打开了一扇窗,让我看到了语文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丰富多彩。也是在这段时间,我迷恋上写诗作文,其他同学一周最多上交一篇,而我是每天一篇。倪老师不厌其烦地为我批改,除了字句的修改,更多的是对习作的整体评点,有时批改评点的文字比我的作文还要长,成了我写作的教科书。这使得我每次将作文交上去以后,心里就有了一种期待,盼望和等待着倪老师的评点。

因为是“五·七学校”,上课时间比普通学校要少很多;因为学校办在偏僻的高山,学习环境也就闭塞;因为是新办学校,没有图书室也没有实验室。但当时的我已经十分满足,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我感激我的学校,为我提供了继续读书的场所,使年轻

的我心存希望;我感激我的老师,在特殊的年代指导少不更事的我走过了一段特殊的路程,无论是语文、数学还是物理、化学,老师在我们心田播下的知识种子,遇到春风就会发芽生长。正因为有了冠峰中学这两年半的学习,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来临,我才会有勇气毫不犹豫地带报名参加考试。

■ 劳动

“五·七指示”要求学生“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,不但要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。由于条件的限制,“兼学别样”在我们学校就只剩学农了。入学以后,每周有两天半的劳动课,修建校园期间,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劳动,往往是放下课本便拿起竹杠扁担。

公社林场留下的106亩茶山成了学校的劳动基地,“以茶养校,茶边育人”,茶树的培育管理,茶叶的采摘制作都由学生承担。冬天,开垦茶山、深锄茶畦,往往寒风扑面但又汗流浹背;春天,绿满茶园,云雾缭绕,同学们捧着脸盆,分散在茶垄间采摘茶叶,看起来充满诗情画意,但时间一长,就感到单调乏味。开始的时候茶叶产量较少,采摘下来的茶叶都由我们自己手工制作,但到了旺季,大量鲜茶来不及制作,只得挑到八里地外的天台县横山顶村去加工。无论是风雨之天还是漆黑之夜,同学们都要沿着崎岖的山道,将鲜茶叶送去,把成品茶挑回。

每到周末放假下山的时候,学校就组织大家顺路替供销社担货,赚一点“脚力钱”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。有时候也去各个山村将赞助办学的木头、毛竹扛到公社所在地高塘出售。两个年级上百个学生,肩挑背扛,在盘旋的山路上长蛇般行走,气势颇为壮观。

同学们绝大多数来自农家,劳动是童子功;我虽然生活在农村,但因为是“居民户”,真正的农活干得不多,高强度的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。开始的时候,砍下木柴不知如何捆缚,捆好了又没办法穿进竹杠。别的同学可以挑上百斤的货物、扛四五根大毛竹,而我挑起担子颤颤巍巍,扛着竹木摇摇晃晃,没有少出洋相。每当这个时候,总有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帮我解围。好在那时青春年少,再不缺的就是热情和朝气,往往一天劳动之后精疲力尽,睡了一觉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。渐渐地,我也能够在陡峭的山崖攀上爬下砍柴伐木,在蜿蜒的山路挑着担子健步如飞,劳动不仅使我学会了技能、增强了体力,更是磨炼了意志、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。